

第十五章 入关和南下

在平津战役中

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我东北野战军在关外已没有大仗可打，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准备随时领受新的战斗任务。我们第一兵团奉命开到了抚顺进行休整，以恢复体力，补充兵员、粮草，同时进行思想动员，做好进关作战的准备。

在抚顺，野司原打算让我们休息一个月，大约只休息了一个多星期，军委便电令东北野战军主力，以最快速度入关。后来才知道，当辽沈战役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做的时候，程子华同志根据军委的电令，已经率领第四纵、第十一纵等部队，作为东北野战军的先遣兵团，日夜兼程，荫蔽入关，向北平附近疾进。他们在辽沈战役后连一天也没有休息。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得驻防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华北

“剿总”傅作义集团成了“惊弓之鸟”。是撤是守，是西窜还是南逃，傅作义尚在举棋不定。他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入关作战，因此未定下立即逃跑的决心，把他的部队摆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一千余里的铁路线上，形成一字长蛇阵。这时，在长江北岸，我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已经打响。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洞察了傅作义的心理状态，决定想方设法把这股敌人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以减轻淮海等战场的压力，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所以急调东北野战军入关，下了一着敌人没有想到的妙棋。

记得传达中央军委的电令时，还曾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你们如果不想抓住敌人，就多休息几天；如果想抓住敌人，就不能休息，要马上进关。听了毛主席风趣的话，部队情绪非常活跃，一致表示要早日进关，早日抓住敌人。

那时政治委员肖华同志已调离第一兵团。兵团领导只有我和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唐天际、参谋长解沛然四人。确定由我们带领进关的部队是第一纵、第三纵、第六纵、第十纵四个纵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四个纵队分别从沈阳、锦州附近先后启程，向关内挺进。我们兵团部分乘十多大卡车，比部队晚几天启程。我坐的是一辆中吉普。这些汽车都是解放东北的战利品。

部队分别从喜峰口和冷口越过长城，经过二十天左右

的急行军，步行一千多里，于十二月中旬先后到达了北平附近。

我们兵团部开始是走在部队后面，从喜峰口进关后，便逐渐走到部队前面了。一路上，我们看到部队成四路纵队行军，情绪非常高涨。所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所过村庄，路口两旁桌上都摆满苹果、花生、鸡蛋。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家家门口设置了茶水缸，每到一家都有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和铺得整整齐齐的热炕。看到这样热烈的情景，我们很受感动。人民群众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子弟兵啊！

我们到达北平附近时，平绥线上的敌人，已被我华北野战军和我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敌人西逃之路已被切断。我第十一纵在北平附近的密云歼灭敌人一个师，四纵在十一纵协同下，歼灭了怀来、康庄地区敌人两个军的主力。随后，十一纵占领了南口，傅作义慌忙收缩他的兵力。怀柔、顺义的敌人撤到了通县，涿县的敌人撤到了丰台、门头沟。

为了不使敌人决策从海上逃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于十二月十一日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命令我东北野战军主力，要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最快速度同时切断津、塘和平津之间敌人的联系，对敌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我第一兵团当时的战斗使命，是迅速切断平、津之

敌的联系，担负着从北平东、南两面围歼敌军的任务。

根据军委和野司的指示，我已到达丰润、玉田一带集结的各纵队，便继续向北平市郊挺进。韩先楚领导的三纵，作为先头部队，在进抵香河地区后，于十二月十三日首先以一个师围歼通县的敌人，两个保警中队被歼，俘敌二百五十多人，其余的敌人乘机逃进北平。另一个师于同日深夜包围了马驹桥，歼敌一个连。十四日，又乘胜歼灭了青云店（大兴）附近之敌。这样，我们部队便迅速逼近了北平近郊。我兵团领导机关随后跟进，到了通县东南的永乐店，把兵团指挥部就设在达里。

十五日，我们发报给第三、第六、第十纵队，迅速进行战斗部署。确定三纵以一部控制南苑机场，阻止敌机升降；另一部在北平东南布置两道阻击线，随时准备阻击北平可能突围之敌；其余全部集结于马驹桥附近作为机动兵力。十纵以一部分兵力控制采育镇、廊坊、四州、万庄一线，迅速构筑有相当纵深的阻击阵地。并以安次、武清为前哨警戒阵地，随时准备堵击由北平突围和由天津接应之敌。该纵主力集结在采育镇附近，随时准备机动作战。六纵集结于郭县镇、安平镇、马头镇、永乐店地区，随时准备机动作战，阻击由北平突围和由天津接应之敌。这样，我们在其他纵队的配合下，就迅速完成了从东、南两面包围北平敌人的部署。这时，根据军委和野司指示，我负责指挥的部队，除进关时的四个纵队以外，又增加了最早进

关的东北第十一纵和华北第七纵。

我负责控制南苑机场的三纵一一八师,在领受任务后,即迅速向南苑之敌压缩。他们派出一个团于十七日凌晨,冒着凛冽的寒风,在炮兵部队的配合下,一个奔袭,就把敌人守卫机场的一个团打垮了,当即控制住了机场,切断了敌人空中的联络,造成了敌人空运的极大困难。两天后,北平之敌派出一个师的兵力,附坦克十六辆,山炮十余门,分两路向我守卫机场的部队猛攻,妄图夺回机场,恢复空运。我守备部队顽强阻击,后续部队又及时赶到。敌人发动了三次冲锋,都被我打退了,并击毁敌人坦克两辆,毙伤敌数百人。

二十五日,野司电令我们,如果北平的敌人依托永定河、运粮河突围时,我们应该以足够兵力,在郭县镇、采育镇、旧州之线顽强死守,以吸引和扼阻敌人,然后集结主力,以各个击破的手段,从侧后歼灭敌人。极据这一作战原则,我们又于二十六日电令各纵队,调整和加强了兵力部置。除前面提到的三纵、六纵、十纵的位置和任务大体不变以外,确定敌人突围,第十一纵的主要任务是从三纵右侧向敌突击,以切断敌人归路;一纵则集结于旧州、廊坊、韩村地区,以配合三纵、六纵,对敌人形成钳形攻势;华北七纵的主力集结于宛平东南地区,控制固安至宛平之间的永定河各桥梁渡口,阻止敌人渡河。

这一部署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在北平之敌华北“剿

总”及两个兵团部、六个军部、二十二个师，共二十五万人，便都被我军包围得水泄不通了。

差不多在这同一时间内，我东北野战军其他部队，也都完成了对天津和塘沽敌人的战略包围，切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逃之路。而被围困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处的敌人，也被我华北野战军和东北先遣兵团一举歼灭，傅作义西逃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

在这以后不久，我一纵被调往天津，参加即将发起的天津战役去了。

兵力部署完成后，攻城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首先抓紧了对北平市郊东南两面兵要地理及敌人防御配系的战役战术侦察。除各部队对自己防区范围内的敌情各自负责侦察以外，兵团又从各纵队抽调人员组成两个侦察站，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访问熟悉情况的老人、现场察看等各种方式，把北平从古城以外的基本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对城墙以内敌人纵深兵力配备情况，也摸得差不多。

当时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是以古城为基本依靠，并充分利用城外的古坟、砖窑、古庙、工厂等特殊地物，作为防御阵地。据古籍记载，内城基厚十八点六米，顶厚十五米，外城基厚九点九米，顶厚六点六米。敌人对城墙的利用挖空了心思。东面一般布置两层射击阵地，城上有单人掩体，突出部分有重机关枪掩体。城顶有交通沟，部分

地区还有一些坑道式的战沟，便于荫蔽。大家对城墙作了全面的分析，既看到它既高又厚等优点，又发现了它的许多弱点。例如，城墙上虽有马道便于敌人运动，但也有利于我军的进展；城墙宽厚，便于敌人防御，但也有利于我军炮火的命中；城墙虽高，但城外紧靠墙根有不少煤堆和煤渣堆，便于我军攀登。此外，大家还对城墙外的土质、河流、道路、树林等情况，也进行了侦察分析。

通过侦察，对于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纵深配备的情况，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例如，对敌人营以上部队的分布位置，绝大部分已侦察清楚；对敌人阵地上何处有暗火力点，何处是地堡群，何处有多少门炮，也大体上摸清楚。当时城内除了东、西交民巷、王府井等少数几处大街有西式建筑外，其余皆为中国旧式建筑，都不够坚固。北平胡同多，但究竟有多少？记得有个老汉告诉我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这话虽不确切，但也说明胡同多得难以计算。

北平工业不发达，敌人构筑工事缺乏坚固材料。原先虽有个水泥厂，但国民党军占领三年，只开工二十天。石景山炼钢厂在敌人控制期间，一直没有开过工。这样，敌人构筑的各种工事，几乎都是土木结构，同东北几个城市敌人的工事相比，其坚固程度相差大远了。

对敌情的深入侦察，大大增强了指战员们攻进北平并对敌人展开巷战的信心。

在这同时，各部队广泛开展了敌前练兵，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攻城部队苦练爬城技术；炮兵部队精确计算在城墙上轰开一个缺口，需要多少发炮弹；阻击部队修好了一道道防御工事；后勤人员从南苑、丰台的原国民党仓库里运来了被服，补充到各部队。后来得知，从我军包围北平的那天起，为了使这座古城免遭战火的毁灭，我北平地下党组织，即已同傅作义方面就和平解放问题开始接触。当时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得知很少，精力都集中在练兵和打仗上。

在这段时间，我带领参谋人员到各纵队司令都驻地和一些都队阵地去检查了战前准备工作。到达十纵驻地时，我对纵队司令员曹里怀说：“在东北，你们十纵打阻击是出了名的。这次把你们摆在平津之间这个关键位置上，你们可一定要打好啊！”曹里怀信心十足地回答说：“司令员，您就放心吧！我们保证让敌人一个也跑不了！”其他纵队的领导和战士们也都一样，个个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以我军歼灭五十多万敌人而胜利结束。傅作义从陆上南逃的道跑完全被切断了。

一月十五日，我东北野战军第一、二、七、八、九纵队，在刘亚极的统一指挥下，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一举解放了天津。随后我被任命为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兼八纵司令员陈伯钧被任命为警备区副司令员。我由于在北平附近离不开，警备区的工作主要是陈伯钧在

那里负责主持。

一月十六日，我平津战役指挥部向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随后，双方派代表经过几次谈判，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接受和平改编。一月三十日，傅军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我们千里跋涉，来到北平市郊，在一个多月里做好的各项战斗准备，虽然都没有用上，大家心虽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汗并没有白流，没有我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和充分的攻城准备工作，要想和平解放北平，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这是继和平解放长春之后，再次和平解放一个大城市，而且是古都北平。这意义是很深远的。还记得我们进关路过遵化时，曾去参观附近的东陵，只见那里的文物被糟塌得不成样子，连墙上的金粉都被人用刀刮掉了。当时，我找到当地干部，建议他们派了一支地方部队，才把这一古迹保护了下来。现在，北平众多的文物古迹得到了保存，我的高兴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几天后，我三纵的一一八师指战员，作为我们部队的代表，参加了盛大而庄严的入城仪式。随后，我和部分同志也进了城，到了天安门，到了北京饭店，参观了几处有

名的古迹。几十年中，我虽然几乎走遍了全国，但却是第一次见到文化古都北平。

进 军 武 汉

平津战役结束前后，部队正式执行中央军委统一颁发的新的编制番号。以原一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我任司令员兼政委。陈伯钧、唐天际仍分别任副司令员、副政委，解沛然仍任参谋长。兵团下辖三个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六军，即原来的三纵、八纵、九纵，军长均由原来的纵队司令员改任。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部队在市郊休整待命。一天，野司在北京饭店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除对平津战役进行总结以外，还传达了中央军委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四野的进军方向被指定为中南地区。随后不久，我就接到正式命令，由十二兵团领导机关带两个军，约十二万人，作为进军武汉的先遣兵团。这两个军，一个是属十二兵团建制的第四十军，另一个则是后来归第十五兵团建制的第四十三军，即围北平时的六纵。

当时全国的战争形势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正规军只剩下一百余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防线上。但它仍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企

图利用长江防线，拒我于长江以北，争取时间扩编军队，然后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军继续向长江以南进军，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四十军、四十三军从北平市郊先后出发，沿平汉路东侧，跨越华北平原，跋涉了二十余天，大约于三月下旬，先后到达郑州以东、陇海铁路以北地区。兵团部晚一些时候才启程，仍然乘坐进关时的那十多辆卡车，经济南到了开封一线。

这时，我二野、三野的千军万马都已在长江下游北岸集结，积极准备渡江作战。而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有“小诸葛”美称的白崇禧，则仍坐镇武汉，并把他的嫡系主力第七军和其他一些部队，部署在靠近湖北的信阳、驻马店、确山一带，摆出一副企图阻止我军解放武汉的架势。因此，我先遣兵团面临的头一项任务，就是力求以奔袭手段包围信阳的守敌，迫使白崇禧集团增援，在江北与我决战，即使不能把敌人消灭，也要紧紧吸引住它，以掩护我刘、邓大军过江。

本来，我们在对地形、道路进行了认真勘察以后，并考虑到易于部队荫蔽，已选择决定兵团主力从平汉铁路西边的豫西大道进军，直接插到信阳以南的应城、花园、孝感一带去，以截断信阳之敌的退路。后来得知白崇禧的主力集中在平汉路东侧，严重威胁到我刘、邓大军渡江部队

的侧背，走豫西大道时间上来不及，于是断然改变计划，决定两个军都沿平汉路东侧南下，以尽快抓住信阳之敌。在具体部署上，首先命令四十军以西个轻装师从黄河北岸乘火车到许昌下车后，经郾城、上蔡、正阳，尔后取捷径，奔袭信阳地区的敌人。四十军的另两个师和四十三军两个主力师沿此同一路线随后跟进，四十三军的另两个师则沿平汉路东边的周家口、潢川、黄安，直接插到黄陂一线去，以策应与配合信阳方西的作战。这样，可以争取提前四、五天迫近敌人。

就在我军日夜兼程挺进的时候，狡猾的白崇禧突然把他的嫡系七军守信阳的一七一师往南撤走，只留下一支掩护部队。我先头部队四十军的两个师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收拾残敌。一二〇师于三十日收复驻马店，三十一日收复确山，四月一日收复明港、长台关。我一一八师长途奔袭一百六十里，于四月二日晨解放了河南重镇信阳，接着又继续南进。四天之内，共歼敌七百余人。

与此同时，位于平汉路两侧由王宏坤领导的桐柏军区和由张才千领导的江汉军区，在我十二兵团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集中了五个旅的优势兵力，围歼信阳南边花园市两个团的敌人。敌人一个团闻风逃窜，而白崇禧嫡系七军一七一师的五一二团却被全部歼灭，计打死打伤敌人七百余人，俘敌一千三百多人。

在四月上旬的几天里，我先遣兵团部队都已进入湖北

境内，乘胜歼敌，相继解放了花园、汉川、应山、广水和鄂东的浠水等大片地区。在攻克广水车站时，截击了由信阳南逃的白崇禧部一九七师的一个团及河南保安第三旅，活捉敌八百余人。

在围歼花园地区敌人的战斗中，我军缴获了白崇禧打给他的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的一份机密电报。在电文中，白崇禧虽然不得不承认“民心离散，士气消沉”，但他仍然毫无悔改之心，不但没有向人民投降，以实现和平的打算，而且企图割据华中和西南，并联合其他军阀，决心作“殊死斗争”，并打算乞求帝国主义的援助，以“振兴为雄”，卷土重来。这是一份很好的反西教材，使指战员们进一步增强了斗志，增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信阳解放后，我们兵团部即移驻到湖北和河南交界的鸡公山。那个不大的火车站成了我们兵团的司令部。我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则被安排住在离车站不远的一座小别墅里。在这里，我们大约住了一个多月。

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正在北平和我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我二野、三野的渡江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为了牵制住白崇禧，不使他立即决策渡江狂逃，我们根据军委和野司的指示精神，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待命，暂勿继续迫近汉口。

休整期间，部队传达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了“约法八章”，研究了南方作战的特点，积极进行着

解放武汉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期间，我们接到野司和中原局的电报，告知我们：为了适应渡江作战的需要，四野的大批后续部队已经开始和即将南下，途经湖北境内时，必须为他们准备充足的粮草。我们于四月六日邀请当地桐柏、江汉军区的负责同志和驻在附近的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等同志一起研究了筹集粮草的计划。当时，江汉、鄂东一带全系刚解放的新区，工作毫无基础，要筹集够几十万兵马食用的粮草，的确不易。但这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只有迎难而上。经过商讨，各军区划分了筹粮地段，落实了人力和运输工具。军民同心协力，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筹集到几千万斤粮食，保证了尔后大军过境时的食用。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第二天，毛主席、朱总司令便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紧接着，我二野、三野大军便渡过天堑长江，追歼穷寇。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首都南京，接着又迅速解放了江南许多城市和大片地区。这时，我们也及时命令部队向汉口，向长江北岸迅速推进。

四月底，位于汉口正面的我四十军的两个师已占领了监利、孝感一带。我四十三军和四十军的另两个师则迅速向鄂东的黄岗、蕲春一带推进。在我二野、三野大军已彻底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和我四野先遣兵团也即将渡江的形势威逼下，白崇禧于四月二十八日在武汉召开紧急军事

会议，研究对策。他看到武汉是守不住了，为避免其主力被歼，便首先将他的第七、第四十八两军，从汉口撤到了长江以南。

五月十三日，鄂东我军迅速占领了黄冈、蕲春一带的长江滩头阵地，歼敌八个营。

十五日，我一一八师肃清了武汉外围的敌人，于十六日拂晓到达滠口时，发现汉口的敌人已弃城南逃。我军随即向市区急进，于当日占领了汉口。十七日我军进占武昌、汉阳。于是，武汉三镇宣告解放。

在这同时，我四十三军和四十军的两个师，于五月十六日在黄冈附近乘势渡过长江，追歼逃敌，经鄂城、保安、大冶，于十七至十九日先后攻占了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曾大败军阀吴佩孚的著名军事要地贺胜桥、汀泗桥及其附近的咸宁城，一举扫清了武汉东南外围的残敌。

武汉解放后，经军委任命，由谭政、陶铸、肖劲光、倪志亮、唐天际、张平化等十三人组成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谭政、陶铸分别任正、副主任。我被任命为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朱涤新任副司令员，敌委由谭政兼任，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留在汉口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是四十军的一一八师，该军的一五三师守武昌，汉阳则由当地军区派了一个旅驻防。

在汉口解放的前一天，即五月十五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

率一个军部、四个师，约二万人，于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宣布加入人民解放军。起义后，张轸先派来一位代表，与我兵团联系。几天后，他自己也来到汉口。我见了他，听他谈了起义的经过和提出的一些要求。据他说，武汉告急时，白崇禧曾把他召来汉口，拿出一份电报，暗示有人密告他有“叛变”企图，想扣留他，并强令他的部队往南撤退。他察觉以后，托放逃回金口。随后，白崇禧派了两个团把他的兵团司令部包围起来，缴了械，连电台密码金被缴去。十六日，张轸派部队截击白崇禧由武汉撤退的部队，由于部署错误，反遭受据失。他管辖的另一个军，因不同意马上起义，已撤往湖南境内。谈话中，他表示无条件地听候处理，但又流露出他的起义与傅作义不同，傅是被迫订城下之盟，而他是主动起义。对于他的起义行动，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并积极为他解决了粮食、经费等问题，要求听候指示改编。以后该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

武汉是华中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当时已有一百二十万人口。解放前，一方面它曾经是吴佩孚、肖耀南、蒋介石、白崇禧这些反动军阀、官僚和官僚资本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屠杀人民的罪恶堡垒；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近代史上这一辉煌大革命的中心地，有着“二七”大罢工和收回英租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这样一座重要城市回到人民手中，

无疑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白崇禧在逃离武汉之前,对这座大城市曾经进行了有计划的大破坏。计划包括炸毁汉口最大的水电厂,破坏电信局、邮政局,炸毁轮船码头、民用航空机场、铁路公路的车站,破坏机械厂、修理厂、炼油厂、纱厂、面粉厂……等等。为指挥这项破坏工作,白崇禧于五月十四日由广州飞回武昌。翌日从下午四时起,轰隆的爆炸声即响遍全市,彻夜不停。一夜间被破坏的趸船即达三十余艘,轮渡码头被毁了,平汉线自花园以南较大的桥梁全遭破坏。

第一纱厂、电信局等单位也遭到部分破坏。由于我军的迅猛推进和全市广大职工进行英勇斗争,才大大减轻了损失。

职工们的斗争既勇敢,又机智。以武汉电信局为例,白崇禧曾下令要把这个单位迁走。员工们闻讯后,立即成立了应变委员会,组织大家展开了反迁移反破坏的斗争。白崇禧命令他们将最重要的机器尽先运走,员工们想了个主意:把仓库内不能用的一些破烂机器,分别装在几十个漂亮的大木箱里。愚蠢的反动派自以为得计,将这近百吨废铜烂铁当作完好的机器器材用火车装运走了。十五日上午,局方接到通知,限十六日拂晓以前,将所有机器运走。员工们奋战了三个多小时,把那些重要机器拆卸分散隐藏起来,一时拆不下来的就进行伪装,或用沙袋把机房的门窗堵起来,或用桌椅板凳把机器掩盖起来。午后,白崇禧

的五十八军果然派了一个工兵连，带着满箱满箱的炸药，开到了电信局门前。可是，大门给沙袋堵得严严实实，工人们手持木棍在四周守卫着。敌人绕着房屋转了一圈，无从下手，只得溜了。

我军进驻市区的部队，自觉遵守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欢迎和赞扬。有一支部队到达汉口时，已是万家灯火。经过七十里的急行军，部队非常疲乏，但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房子，他们就在街头露营。为了不影响市场秩序，一一八师规定，在五天之内，除伙食单位买菜外，所有人员都不得购买东西。各部队的牲口全部牵出城外，以保持市容整洁。各单位人员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上街，不看戏，群众送给慰劳品一一婉言谢绝。当然，也有个别同志言行不够谨慎。例如有个别领导干部对新闻记者随便发表谈话，泄漏了一些不该泄漏的事情，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象武汉这样的一个大城市，要想很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这里，不仅有大量细致的组织工作要做，而且也有着严重的政治斗争。

在这方面，武汉市党的地下组织配合我军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例如，从白崇禧的部队逃离武汉到我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这中间有十多个小时的空隙时间。这时，党的地下组织便主动出来掌握警察，组织防护团、自卫队等，维持交通治安，护厂护校，分散、荫蔽船只，

调查接管物资，随后又有组织的到郊外欢迎我军入城，并积极提出关于做好城市接收工作的意见，使武汉三镇大体上保持了完好，并能迅速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在众多的地下组织中，记得以武汉市委公开露面的时间最晚，但他们做的工作却最好。而其他的一些地下组织，大概是由于长期埋伏，一经解放，欣喜过望，只凭热情去做工作，加上有个别党性不纯的人，急于求功，或想趁机捞一把，工作中也捅了一些漏子。随意发表违背党的政策的言论者有之，擅自张贴布告，接收、查封仓库、资财者亦有之。发现这些现象以后，我们立即找各组织的负责人个别谈话，随后又召开会议，统一行动方针。我们首先肯定了这些组织的工作成绩，然后指出已经产生的缺点，要求大家在军管会未作统一规定以前，统一由兵团政治部指导他们的工作。当即得到到会人员的一致同意。这样一来，混乱现象逐渐得到克服，市区秩序安定多了。

当时市区内还有国民党留下的警察武装千余人，土匪武装数百人，还有一部分伪市府管辖的乡街武装。在武汉市周围，也有一些土匪。对于这些武装人员，我们警备司令部下令一律收缴其武器，对人员分别进行了妥善安置。武汉上游的长江边上，有一个叫张珍的土匪头子，自称拥有几千人（实际上只有七、八百人）。有一天，他派自己的女婿来到汉口，要求收编他们。他敢于派女婿前来，我看他是有诚意的，于是写了封信，派了一个参谋前去，把这

部分武装收编了。这些措施，对于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都起了良好作用。

最严重的斗争是对付那些趁混乱之机擅自拉扯起来的冒牌武装。其中有由商团组织的所谓“人民纠察队”，有由歹徒拉起来的什么“保警队”，特别是有个叫余成的家伙，打出“人民解放军挺进队”的旗号，自封队长，在汉口、武昌到处流窜，强行收缴别人的武器，接收物资，还出布告，说是“奉命接收一切官僚资本”，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我军的声誉。对于这些冒牌组织，我们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一律予以取缔。

在掌握舆论工具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部队进城的第二天，就发现有人出版了一张叫《解放新闻》的报纸。报纸上刊登的损道、文章，许多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它擅自发表《告武汉人民书》，私拟人民解放军口号，自订对待国民党特务、军队、伪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五条政策，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一查，原来这个报社是国民党原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武汉日报》的原班人马，其中半数以上系C·C分子。对于这样一张报纸，我们当然不能让它继续办下去，只出了三期，就被我们明令停刊了。还有，原汉口广播电台，白崇禧逃离时已将它破坏。解放后，留下的一些人员修复了一部电台，未经许可，便又自称“汉口新华临时广播电台”，擅自进行广播。发现后，我们也令它停止播音。几天以后，华

中局和武汉市军管会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出版了，电台也接收过来。这样，舆论工具便掌握在我们手里，成为宣传党的政策的重要喉舌了。

在武汉，我们除了整顿，维持社会治安以外，还积极进行进军湖南的准备。各项工作都进展得比较顺利。只是在离开武汉前夕，部队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原来，我们从抚顺南下时，带了三百多桶汽油，一直节省着用。到武汉后，装上了货轮，打算从水路运往湖南备用。一天晚上，一个战士握着马灯到货轮上去检查。由于有些油桶渗油，不小心，马灯倒在甲板上，引起汽油着火。顿时，烈焰冲天，江面上一片火海。一船汽油被烧得精光，还烧伤了好几个人。事故发生后，我们认真作了检查。军委总部也发出通报，对我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两个多月以后，当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时，我们兵团便离开武汉，冒着酷暑向长沙进发了。

和平解放长沙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接受我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部起义。于是，长沙宣告和平解放。

长沙能够和平解放，是我党做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和我军强大的军事攻势等诸因素促成的。

从这年春天开始，当北平、天津、太原等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以后，我湖南党的地下组织，在省委书记周里同志的领导下，便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做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

程潜是国民党的元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他就曾率部由湖南到广东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阵营，任大本营军政部长。我在延安期间，他坐镇西安。虽然没见过面，但是函电来往甚多。他有过反共的历史，但同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之间，又往往貌合神离，时有矛盾。他曾同李宗仁竞选过副总统。失败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给他封了个“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官衔。在我大军渡江前后，白崇禧使用各种手段，想死死拉住程潜，联合组成所谓“湘桂防线”，以负隅顽抗。但形势的迅猛发展又使得程潜不能不考虑到，同白崇禧拴在一起，只有死路一条。是战是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程潜都在十字路口上徘徊不前。

陈明仁原是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国民党的一员“猛将”。在四平一战中，他的部队曾被我军歼灭殆尽。他被蒋介石撤消职务，投置不用。以后白崇禧组织华中“剿总”，企图扩大桂系势力范围，拉陈明仁当了兵团司令。武汉解放前后，白崇禧把陈明仁调往长沙。原本想让他校制住程潜，以巩固“湘桂防线”。但大势所趋，陈明仁 and 程潜的私人关系又较深，白崇禧的这一步棋反而促成了程、陈两

人结合在一起。

武汉解放以后，我们在做好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争取程、陈和平起义的工作。湖南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在做，军委总部也在热心关注和过问这件事。程潜周围有一些倾向进步、主张和谈的有识之士，党的地下组织首先同他们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去掌握程潜、陈明仁等人的思想动向，陈述和与战的利害关系，打消他们对起义后的种种顾虑，坚定他们走和平起义这条道路的决心。就我所知，当时总部和野司派来做这项工作的李明灏先生便起了很好的作用。

李明灏是一位民主人士。他和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人。北伐前，程潜办了一个讲武学校。程自任校长，李明灏任他的教育长，陈明仁是他们的学生。一九二七年，程潜在汉口重建新六军时，李明灏任过他的第七师师长。次年，程潜被李宗仁扣押，李明灏又代理过第六军军长。由于有这些历史关系，派他来做程、陈的工作，实属人地相宜。当时他往来于长沙、汉口、北平之间，费了不少唇舌。在汉口，我会见过他，听他谈过工作进展情况。长沙解放后，他被调回武汉，任湖北省政府副主席。

七月间，我四野南下大军，发起了宜沙和湘赣战役，迅速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和湖赣边广大地区。我十二兵团部队顶烈日，冒酷暑，翻越幕阜山，于十九日连克距离长沙都只有几十公里远的平江和浏阳两座县城，兵临长

沙城下。

在这同时，根据军委指示，四野组成了一个五人和谈代表团，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解沛然、袁任远、李明灏四人为代表。金明原在华东野战军工作，袁任远原在湖北工作。他俩都是中央确定长沙解放后到湖南担任领导职务的。后来，金明担任了湖南省委第二副书记，袁任远任省府副主席。代表团于七月二十二日到达平江，和程潜、陈明仁派来的代表程星龄先生举行了谈判。程星龄与程潜是本家，又是程潜智囊团中的头面人物，是一位积极赞成和谈的进步人士。他建议代表团派人到长沙去直接同陈明仁谈。因当时程潜在宝庆（邵阳），兵权又主要握在陈明仁手中。开始，金明觉得应该由自己去，但李明灏担心别人去有风险，便自告奋勇，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先期到了长沙，当面和陈明仁进行了洽商。在我大军压境和我党和谈政策的感召下，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终于对四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代表团所商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诚意接受，并逮捕了国民党在长沙的一些特务分子。当然，对于程潜、陈明仁提出的某些要求，我们也作了些让步。例如，陈明仁坚持改编他的部队时，要用“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番号，经请示中央同意，可以暂时使用。对于他们不愿放弃的省府主席和兵团司令等职务，根据中央电示精神，我们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发出通电，正式宣布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城。当日，我先头部队便进驻长沙市区。几天以后，起义部队离开长沙，开到了浏阳集中改编，当时用的番号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

毛主席、朱总司令于十六日电复程潜、陈明仁，对他们的起义一举深致赞扬，同时予以勉励。电文中说：“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

与此同时，军委和野司指示我们，根据湖南目前的形势，存在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必要的，希望我们从大局着眼，积极团结他们做好工作，圆满完成湘南面临的繁重任务。

为了推动程潜发挥作用，中央军委曾考虑给他一个“西南宣抚史”的官衔，便于他好去做工作，推动当时西南地区象龙云这样一批国民党将领起义。后来因程潜不乐意才改变办法，在长沙成立了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以程潜为主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为副主任，程潜、黄克诚、唐生智、肖劲光、王首道、陈明仁、仇鳌等十三人为委员。还成立了临时省政府，以陈明仁为主席。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也随之成立，我被任命为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任

副主任。

进驻长沙以后，我会见了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彼此握手言欢，互致祝贺，相期以同心协力，做好湖南的工作。我还分别找了追随和积极赞助起义的一些进步人士，如程星龄先生等交谈，了解了他们起义的经过，了解到程、陈二人和他们周围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性格特点等等不少情况。

九月初，程潜、陈明仁先后启程，经武汉赴北平去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武汉，四野的领导人分别会见了他们。记得陈明仁启程时，我派了团职参谋张伯禹同志率领一个营护送他去汉口。因为当时路上还不安全，特别要防止那些反对陈明仁起义，还在负隅顽抗的小股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我还让张伯禹同志带去一笔钱，送给陈明仁作盘缠。他把钱退回来了，并传话表示感谢，说人民的钱，留着以后会有用的。

帮助陈明仁改编和整顿好这支起义队伍，是当时落在我们头上的一项繁重任务。十一月初，这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下辖两个军，六个师。番号是换过来了，但是人员没有更换，部队问题很多。除了编制、装备不统一，正规化程度差以外，主要是组织不纯，成份复杂，纪律废弛。这支队伍中还有哥老会一类封建帮会组织，还隐藏着一些特务分子、一些来历不明的人，还有一些人暗中与土匪勾结。大多数人虽然有革命要求，

但对党的政策还缺乏正确认识，存在着不少疑虑，许多人留恋旧军队的生活与习气，贪污腐化现象仍很严重。有个军在一个月内吃空缺即达一千余人。部队官多兵少，而且老兵油子多。有个军五十岁以上的老兵就有五百多人。

要改变这样一种情况，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要选调一大批干部，特别是政治工作干部，派到这个部队中去，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整顿，才能团结、改造好这支队伍。早在九月中旬，陈明仁就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从十二兵团“派遣大批政治人员来我部指导学习革命理论”。信中还说：“我觉得这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也是整个部队人员迫切的要求”。随后，野司也电令我们：“为了彻底改造该部队，须从各军抽调大批军、政、供、卫干部，首先与主要的是抽调政治干部，以利这成政治改造之目的。”于是，十二兵团副政委唐天际被调往第二十一兵团任政治委员。还抽调了军、师职干部二十余人，团职以下干部四百余人。此外，从第十三兵团也抽调了一批干部去到这个部队。

这些被抽调去的干部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作风朴实，工作也还称职，但不少同志，特别是一些营连干部，思想顾虑较多，留恋老部队，认为那里工作没有基础，有的怕去了挨坏人的黑枪，有的甚至说什么“到那里去工作，好比羔羊跳进虎群，特务逞凶没法对付”。为了解除大家的顾虑，端正态度，提高责任感，我们把这些干部集中起来训

练了十多天，使大家认识到，到那个部队去工作也是革命的需要，树立了任务光荣、责任重大的正确思想。一致认为，只要紧紧团结广大战士和下级干部，依靠大多数，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工作是可以搞好的。即使有个别坏人捣乱，也没有什么可怕。纷纷表示，要新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再立新功。

这批干部去了以后，在陈明仁和其他一些比较进步的将领支持下，通过学习革命理论，进行民主教育、阶级教育等多种方式，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迅速有了提高，对起义与改编有了明确的认识。有的当众撕毁了国民党党证，有的扔掉了国民党的帽徽。部队风气有了明显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也融洽了。有个师涌现出两个军民关系模范连，大家自觉连守群众纪律，积极帮助驻地人民群众挖鱼塘、修房子。人民军队的许多优良传统，开始在这支队伍中生根、开花了。

参加衡宝战役

长沙和平解放以后，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下的五个兵团、十一个军、二十六个师，共二十余万人，重点部署在衡（阳）宝（庆）公路两侧和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州一线，南与广东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西与湘鄂西之宋希濂集团相呼应，妄图阻止我解放大军向华

南和西南进军。

白崇禧集团当时是华中地区国民党赖以同我人民解放军抗衡的唯一的所谓“精锐”部队。南下以来，我们同他的部队有过几次接触，很想同他决一战，都被他溜走了。第一次前面已经提到，是在解放信阳和武汉的时候，他在武汉顶着我们，我们很想跟他决战，但开始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他牵制在武汉，保障我二野、三野主力渡江。以后，他见大势已去，武汉根本守不住，便不战而逃。第二次是解放长沙的时候，他在那里指挥和拉拢程潜、陈明仁，又跟我们顶住了。我们又想寻找战机同他打一仗，但他老奸巨滑，在程潜、陈明仁宣布和平起义的同时，又把他的部队往南撤到了衡宝一线。

怎样才能打垮并彻底消灭这股反动势力呢？早在长沙解放以前，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便作出了英明的战略部署。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四野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

“判当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的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面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和白部作战方法……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面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当时，我们十二兵团的部队都已进驻湘赣边和湖南境内。由于气候炎热，酷暑难当，加上刚到南方，水土不服，部队又经过长途行军，十分疲劳。因此，体力普遍下降，病号猛增。特别是患疟疾的多，有的部队发病率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以四十九军为例，六月底从湖北天门一带出发南下以后，在两个多月中，病员多达一万三千多名，其中死亡一百三十多人，转院治疗的两千七百多人。八月底，该军到达湖南湘阴一带时，仍有病员三千八百多人。部队的马匹也大量死亡，仅该军的一四七师就死了两百多匹马。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是无法立即继续投入战斗的。于是，在得到上级同意后，我们决定各部队从八月初开始，都在原地休整一个月。在这期间，各部队普遍开展了以突击治疗病号为主要内容的兵强马壮活动，时部队广泛进行了卫生防病知识教育，加强生活管理和卫生检查，作出了不准喝生水、坚持挂蚊帐等项规定。保证部队充分休息，以恢复体力，注意改善伙食，加强营养，还组织大家适当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经过休整，部队体力加强，发病率大大降低，原有病号大都治愈归队了。事实证明，这一休整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衡宝战役的胜利和随后的向广西进军，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九月九日，中央军委命令我四野主力部队继续进军。野司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总的作战意图，决定采取大的战略迂回和包围，然后予以歼灭的方针。在兵力部署上，

决定分三路展开突击。以陈赓领导的二野第四兵团和邓华领导的四野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等部组成东路军，由陈赓统一指挥，从湘赣粤边界挺进广东，歼灭余汉谋集团，断敌海上退路，再由粤入桂，完成左翼战略迂回任务。以程子华领导的四野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其中一个军留在湘西北牵制宋希濂集团，两个军由常德地区出发，首先突破敌芷江地区防线，配合中路军围歼白崇禧主力，尔后向桂西进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我们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向衡宝地区之敌展开正西攻击，由我统一指挥。并以杨勇领导的二野第五兵团协同我中路军作战，其中的第十八军拨归我指挥，另两个军为战役预备队。我们十二兵团共有五个军，即第四十军、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加上第十八军，这样，我指挥的部队共是六个军、十九个师。

当时，野司的指挥部设在汉口，我们兵团的指挥部设在长沙。

从九月中旬开始，我东、西两路军部开始向敌人攻击前进。白崇禧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到了西线。我中路军当时的部署是：以四十六军、十八军摆在衡阳东边的安仁地区，以牵制敌人，配合正西作战。以四十军、四十五军、四十军从东到西依次摆在衡宝公路的正面，作为实施突击的主力部队，四十九军则在四十五军后面，以加强正面突击力量。我们的作战计划得到野司批准后，于九月十五日，

各军即先后开始向指定地区运动。我们要求部队运动时尽量注意荫蔽，严守秘密。于是，四十一军伪装成地方支队，从长沙、平江地区出发，取小道向娄底、谷水前进；四十五军利用二野过境部队作掩护，由江西萍乡进到湘乡附近；四十军则由攸县折向西北荫蔽地向湘潭以南前进；原先就在湘江西侧的四十九军，对衡宝公路正面的敌人严密警戒，封锁消息，保障以上几个军顺利地渡过湘江；而向安仁地区前进的四十六军，我们则要求他们虚张声势，借以掩护我正面突击部队运动，同时给敌人造成错觉，以为我军的主攻方向是在衡阳、耒阳一线。兵不厌诈。我们的这一着，果然起了迷惑敌人、出敌不意的作用。战后被俘的敌七军参谋长邓达芝供称：“我们开始认为，你们的主攻是在湘东安仁方面，于湘东方向布置了夹击的阵势，不料你们的主攻方向却在衡宝线。直到后来界岭东南狮子山、宝台山等几处阵地失守，从俘虏你们的几个士兵口中，才弄清了你们的主攻方向，致使我们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

九月二十日，我们兵团指挥部对打好这次战役发出了作战指示，着重强调了西条：一条是要求各级指挥员很好掌握白崇禧的战略企图和作战特点。指出：白崇禧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军阀，在大势所趋、本钱微小的条件下，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幻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在具体手段上却是装腔作势，以攻为守，布设疑阵，妄图苟延残喘。他惯于使用较有战斗力的嫡系桂军，

依靠他们较为熟悉的山岳地带，进攻时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奔袭包围我突击的小分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引退。另一条是要认真领会上级的战略意图，掌握战役指导方针。指出：这次上级对歼灭白崇禧的战略方针，是针对敌人的特点，使用下围棋“随局按眼”的方法，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一举而歼灭之。我们在战役战术上，主要的是要依靠山地运动战，结合攻坚战、游击战。一切胜利的前提条件在于捕捉住敌人。因此，要注意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敌于奔袭敌后，在敌人纵深中开花，同时要注意侦察警戒。后来整个战役的实践表明，我们一开始就强调提出的这些要求，是正确的，对于保证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避免过早突出，吓跑敌人，野司要求我们中路军完成集结和准备出击的时间，要以西路军到达芷江地区的时间为准。这样，在半个多月中，我们曾多次电令各军暂不继续前进，在原地停止待命。直到九月二十九日深夜，才接到野司的电令，告知我们西路军已接近芷江，东路军已挺进广东境内，命令我中路军各军务于十月一日全部到这战役集结位置。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获悉这一特大喜讯，指战员们个个

心花怒放，斗志倍增，在背包、枪杆上贴上标语口号，互相激励，决心以打好这一仗、多歼敌人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人民共和国的胜利诞生。

各军均于规定时间内集结完毕。这样，我们就命令正面部队于二日十六时开始，兵分三路，一齐向敌发起攻击。当时在这个地区的敌人有七十一军及一二六军一个师、五十八军之一部。在下达这一命令的同时，我们还向兵团所属部队发布了战斗动员令，指出敌人“已同丧家之犬，惊恐万状，我军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绝对优于敌人”，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勇猛、神速、大胆地包围和歼灭敌人。各级指挥员要细心稳健，机敏灵活。全体战斗员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争取在战斗中为人民立功。

三日拂晓，我军便突破了敌人第一线阵地，迫使守敌七十一军后撤。我各部乘胜猛插，在运动中歼灭了几股敌人。至五日拂晓，各军均向前推进了二十至五十公里，控制了渣江至界岭一线，与敌人形成对峙局面。助攻方向，我四十六军一部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十八军主力则绕道向耒阳、郴州间挺进。

一开始，我们的战役意图是：以我向前挺进的强大兵力，迅速插到湘桂和粤汉两条铁路上，把这两条干线切断，不使敌人退入广西，求得在湘南给敌人以大量歼灭。但在敌七十一军的防御阵地被我突破以后，诡计多端的白崇禧急调他的主力七军、四十八军沿衡宝公路两进，还命令原

在郴州的九十七军、原在乐昌的四十六军北上，于十月四日也都先后到了衡宝线上。衡宝公路，全长不过二百余里，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兵力，看来白崇禧是企图乘我立足未稳，进行全面反击。这一新情况的出现，使我们不能不考虑新的对策。

这时，野司判当白崇禧是想在衡宝线上“与我决战”，而“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为了诱敌深入，于四日深夜和五日上午两次电令“各部即在原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等候我兵力之集中”。同时命令我正在芷江地区扩张战果的西路军，转向宝庆、祁阳地区迂回，十八军沿粤汉路向北攻击。为贯彻野司的这一意图，我兵团也于五日上午两次电令各军，充分做好大会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要准备好两手，既要防止“敌人可能集中力量向我作局都进攻”，要“拟定好防敌反击的战斗方案”，又要制定好“敌人撤退时的追击部署”，严密监视，抓住敌人，使之无法逃脱，即令逃跑时，亦能进行及时穷追”。

果然，在这同时，白崇禧先是命令七军、四十八军、七十一军各一部，向我位于西线的四十一军疯狂进行反击，几次进攻均被我打退。他见西边进攻受挫，接着就将主力东调，集中了四个军的五个师的兵力，由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统一指挥，从东南两面夹击我位于东线的四十军，又未能得逞。

接到野司“原地停止待命”的电令以后，我们有的部

队停了一下，有的部队正在同敌人进行战斗，想停也停不住。这时，我四十五军的一三五师正按原计划在强行军途中，没有接到野司和兵团的电报。他们从敌人的间隙中插过去，连续行军二十四小时，前进一百六十里，到五日夜间，已越过衡宝公路，孤军楔入敌后，进到了余田桥正南的灵官殿地区。我一三五师的这一行动，象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威胁着敌人的整个部署，使白崇禧大为恐慌。他连忙调集了四、五个师，分别向我一三五师各团阵地进行猛烈攻击。我军迅速抢占山头、隘口，与敌人激战了一整天。

白崇禧见反击没有占到便宜，现在又被我插进来这样一刀，而且我西路军正在向东疾进，他害怕腹背受敌，便慌忙改变计划，于七日凌晨下令全线向新宁、零陵、新田、嘉禾撤退，命令其主力第七军率领一七一、一七二师和四十八军的一七六、一三八师，向武冈方向前进，以掩护其正面部队撤退时左侧的安全。

第七军是桂系在“七、七事变”后成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实力较强，而且战术手段狡诈多变，一向受白崇禧的偏宠。除了在信阳以南的花园一战中，被我歼灭了一个团以外，实力没有受过多大损失。白崇禧把它看作是一张最得力的“王牌”，在这次战役中，开始把它放在衡阳方面作为总预备队，由他亲自掌握和指挥。接着又把它调到衡宝线上，担任主攻任务。在白崇禧

看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于是又命令它以两个主力师，同时统率另一支主力四十八军的两个师，来掩护其他部队全线撤退。白崇禧对它的信赖是无以复加了。这个军的官兵也自命不凡，吹嘘自己是什么“钢七军”。到达衡宝线之后，竟到处张贴“钢军硬，八路不敢和我碰一碰”一类自吹自擂的标语。我们的战士看后，气愤而又轻蔑地说：“什么钢七军，非把它砸成一摊烂泥不可！”

针对白崇禧全线撤退的突然变化，野司在命令我西路军迅速抢占武冈一线，堵截敌人西退之路的同时，命令我中路军担负攻击的四个军十二个师，全线出击，追歼逃敌。同时命令四十六军主力越过湘江，向衡阳、耒阳前进，十八军加速向零陵方向发展。

在这以后的几天之内，我各路大军，同敌人展开了比毅力、比作风、比速度的大竞赛。当时我们想，要想包围住全部敌人已经不可能了，但只要我军能抓住一大股敌人，加以围歼，也就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于是命令各部队要尽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发现敌人，就要死死把它咬住，然后主动配合，密切协同，打好歼灭战。那几天，正值秋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每前进一里，都很艰难。指战员们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昼夜兼程，猛打勇追。

在追击，一三五师的指战员们表现得最为突出。他

们到处堵截和侧击敌人。敌人疯狂向他们反扑，使他们在连续几天内都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他们时而被攻，时而被围，时而突击，时而转移。行军时有时和敌人走在一条路上，敌人有时出现在他们前头，有时又在他们后面。有时晚上宿营，敌我进到一个村庄，发觉后，双方就打了起来。全师指战员整天整夜与敌人周旋，辗转在群山丛林之间，同数倍于他们的敌人进行战斗。

一三五师的英勇行动，有效地迟滞了敌人逃跑的速度，使我尾敌追击和两翼迂回的部队于七日晚上就将敌人的四个师追上。真是冤家路窄，这四个师正是战士们发誓要把它消灭的敌七军率领的一七一、一七二、一七六、一三八师。第二天，我军就将敌人压缩、合围在文明铺东北五十余平方公里的地域内。

在这同时，我原先担负助攻任务的第四十六军，迅速扫清了衡阳外围各点的敌人，于七日解放来阳，八日解放湘南重镇衡阳。部队进入市区时，受到全城男女老幼的热烈欢迎。

九日中午，我一三五师在祁东县的黄土铺西侧阵地部署战斗。这时，正值敌七军和它的直属队溃逃到这里，企图夺路南逃。该师一个团积极主动，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组织部队截击。部队猛跑四公里，将敌人拦住，随即以猛虎扑羊之势，向敌人发起冲锋，把敌人的军部和直属部队插成数段，顿时敌人陷入一片混乱。另一个团在北面不

远的鹿门前，将敌七军的一七二师截住。

这时，我四十一军主力已迂回推进到了这一地区，完全切断了这几股敌人西逃的退路。正面我四十五军和四十九军的一个师尾敌追击也到这这个地区。为了彻底消灭被围之敌，我们又指挥已到达洪桥地区的四十军从东面迂回上去。该军的一一九师昼夜追赶，在泥泞的道路上奔跑了一百六十多里，翻越过三十里的五峰山，终于在九日傍晚赶到了铁塘桥、杨家岭一带，迅速抢占有利阵地，把妄图从东面突围南逃的敌人也截住了。

当天下午和晚上，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人狼奔豕突，东冲西撞，总想夺路逃跑。我军顽强阻击，非要把敌人消灭不可。在一三五师的各个阵地上，每一条水渠、每一道田埂、每一片森林、每一座房屋，都必须经过反复争夺，甚至白刃相搏，才能为我所占领。敌人向我阵地反扑，有时多达七、八次，但在我顽强阻击下，均被各个歼灭。有的连队消灭了几倍于己的敌人，打到最后自己也只剩下二、三十人。激战至晚上八时，敌七军军部及包括警卫营、工兵营、通信营、运输营在内的直属队，终于被歼灭。军部指挥机关被打掉了，该军率领南逃的四个师便失去了统一指挥，更加慌乱起来。在一一九师的阵地上，战斗同样激烈残酷。该师与夺路南逃的敌人反复冲杀，激战达二、三十小时之久，终于打退敌人四十多次的集团冲锋。有个连用手榴弹一夜就打退了整营敌人的十八次攻击。还有个连

弹药打光了，战士们就搬起石头同敌人拼命。有个排的班排长大部伤亡，一个班长就自动代理排长，组织起剩下的十几个人，坚守阵地，连续打垮敌人整排整连的四次攻击。

十日，我组织了八个师的兵力，对被包围的敌人发起了总攻击。三个师由北向南，两个师由西向东，三个师由东南向西北。被围之敌纷纷为我分割歼灭，残部溃入深山丛林。当夜，秋风萧瑟，细雨迷濛，指战员们忍受着几昼夜连续作战的疲劳与饥饿，在高山密林中冒雨搜剿。至十一日上午，计歼敌二万九千八百余人，生俘敌七军副军长凌云上、参谋长邓达芝、一七一师师长张瑞生、一七二师师长刘月监、一七六师师长李祖霖等将官八名。敌七军率领的桂系四个主力师，除一三八师师部带一个团乘隙逃脱外，全部被歼。

白崇禧的王牌被打掉了。战士们兴奋地说：“看来还是我们的话说得对：什么‘钢七军’，一下子就被我们砸成了一摊烂泥！”

在连续几天的纵深战斗中，由于情况瞬息万变，野司和我们兵团对各军、师的战斗行动，都只能规定一个大致的方向，不可能每一步都进行及时指挥。为了不失掉战机，野司曾要求我们和各部队充分发挥机断专行的精神，不必事事等待上级指示。在这一点上，当时各军各师以至各团、营、连的指挥员，大都做得很好。他们根据上级对这次战役总的要求，积极主动、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寻找战机，

歼灭敌人，有效地保证了及时抓住敌人，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十二日，我四十九军一个师，协同西路军东进的部队，在宝庆附近围歼一股逃敌，全歼了该敌四千余人，随后就解放了宝庆城。

与此同时，我第十三兵团留守湘西北的四十七军，对敌宋希濂部一个军发起攻击，共歼敌五千余人。

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我西路军南下芷江之日算起，至四十七军歼灭宋希濂一部的十月十六日止，历时三十三天，我中、西两路大军共歼敌四万七千余人。我军也伤亡四千余人。至此，衡宝战役胜利结束。野司和我兵团部都发出通令，嘉奖了有功部队，特别是赞扬了一三五师、一一九师等部指战员那种积极主动、勇猛顽强、坚守阵地、敢于拼搏的斗争精神。

在整个战役中，我主力部队得到了湖南党组织、政府和地方游击队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湖南省军政委员会、省临时人民政府和省支前指挥部积极组织征粮支前，把大批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活跃在衡阳地区的湘南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到处打击敌人，在解放耒阳、郴州等战斗中，作出了积援贡献，歼灭了不少敌人。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支援。他们主动为我军当向导，探敌情，递情报，有的保护公路、桥梁，有的翻山越岭，冒着炮火为我军送

水送饭，有的帮助扛炮弹，送伤员。我军战斗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宝庆附近有个六十多岁的私塾先生，开始受白军的欺骗宣传，怕“共产共妻”，把自己的儿媳妇藏进山里去了。后来在我军严明纪律的影响下，他很受感动，用粉笔在门板上写着这样几句话：“自古行军以来，秋毫无犯，未之有也。对于妇人女子，规规矩矩，合理合法，尤未之有也。惟解放军称之耳！”他不仅把儿媳妇接回来，还积援支援我军作战。衡阳地区有位老大爷发现一股敌人，便主动跑来告诉我军，并带领部队抄小路把这股敌人包围歼灭了。

衡宝战役是我军进军中南以来的首次重大战役。这一仗，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各种因素，虽然没有形成一次大的决战，不少敌人仓皇溃逃了。但是，消灭了白崇禧主力中的主力，大大地震撼了各线敌军，把白崇禧想在湖南和广西同我决战的企图打破了，避免了以后在广西境内再打一次大的战役，为后来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解放华南地区创造了胜利的条件。它的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这一仗，解放了湘南和湘西大部分地区，为彻底肃清湖南境内的国民党残部、打开湖南各项工作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方西的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

湖南军区的组建

八月，长沙和平解放，湖南军区即宣告成立。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我任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黄克诚兼任军区政治委员。陈伯钧、韩先楚、詹才芳、文年生任军区副司令员，金明、唐天际、刘道生任军区副政委，解沛然任参谋长，黄志勇任政治部主任。我十二兵团领导机关，同时也是军区领导机关。

长沙解放初期，省委书记黄克诚还留在北京治病，几个月后才到任。程潜又去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样，我得身兼五职：十二兵团司令员、湖南军区司令员、湖南省委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代主任、长沙市军管会主任。在这期间，正进行衡宝战役。我要指挥主力部队同白崇禧集团打仗，要指挥地方部队维护社会治安，还要过问地方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情。会议一个接一个，文电一摞迭一摞，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工作千头万绪，全省和军区的工作应从何入手？这是当时遇到的头一个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在领导层中意见很不一致。一些同志感到，长沙和全省很大一部分地区虽然解放了，但是革命气氛不浓。他们主张立即宣布民主改革，进行减租减息，把革命的浪潮掀起来。另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长沙是

和平解放的，存在统一战线局面，不应该过分强调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眼前最重要的是要把大批干部分配到已经解放了的各县农村去，把政权架子搭起来，随后就抓紧剿匪和筹粮两件大事。而在长沙，要很好团结程潜、陈明仁和他们手下的人，把局势稳定住。持这种意见的，记得有省委第二副书记金明和省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等同志。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有一天，周小舟找我谈了省委内部的分歧，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长沙和平解放不久、湖南土匪又多、缺粮情况严重等情况，觉得工作应该从实际出发，在一次省委会上明确表态支持了后一种意见。经过讨论，大家的认识一致起来了。于是，几千名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很快撤下去了，军区的部队也迅速分到各地去组建军分区去了。而在长沙，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内，各方密切协商，各项工作虽不轰轰烈烈，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最早拨归军区管辖的部队只有159、160、162、165四个师，和从华北地区调来的第一、二、六三个补训师。我们就以这些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了长沙、益阳、常德三个军分区。十月间，衡宝战役取得胜利后，又相继成立了衡阳、邵阳、郴州、零陵四个军分区。与此同时，已进至湘西的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七军也改为地方部队，组建了湘两军区，归湖南军区管辖。由该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分任湘两军区司令员、政后委员。湘西随即成立了沅陵、会同、永顺三个军分区。十一月，军委又决定我十二兵团

的四十六军也留在湖南地区，成立湘南剿匪指挥部，归湖南军区领导。该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分任正、副指挥。这样一来，军区部队有了很大加强，总兵力不下二十万。

湖南是长期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地下党组织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活动，从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后就很活跃。到我军解放湖南时，全省的游击武装已发展到两万多人，活动分布这二十余县，经历了大小战斗一百多次，解放了五座县城和一部分农村，对支援和配合我军解放湖南起了一定作用。对于这部分地方武装，无疑需要军区派人去统一实行改编整顿。军区限期要求他们到指定地点集结，随后就派人去协助他们进行政策和传统教育，并分别情况对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和处理。对少数有较大贡献的负责人安排了领导职务，例如有的当了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或参谋长，有的调到军区当了高参。对那些本质好、表现进步的战士和一部分基层干部，则陆续补到军区各部队。

最为复杂的是还有为数多达十来万各种杂色武装。他们打着各种不同的番号（据我们初进长沙时统计，就有四十九个不同番号），各据一方，任意封官加委，征粮征款。有的还四出抢掠，纪律极坏。怎样收编和安置好这批杂色部队，是军区成立初期遇到的一个很伤脑筋但又不能回避的复杂问题。

我们首先是通过各种途径，对各地杂色武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其中确有一部分是和我党地下组织有

联系的敌后武装；另一部分是我党外围组织建立起来的关系武装，有的则是由各种人物自动组织起来，然后再与我外围组织拉上关系的；还有一部分则系敌人留下来或当地地主组织的反动武装，其中有的是原来的反共救国军，临解放前才打出了革命旗号。

情况摸清了，我们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收编和溶化，既没有操之过急，也没有把他们放在一边不管。对那些同我党地下组织确有联系的部队，象上述对待党的游击武装一样，一般是命令他们到某地集中。他们大都能服从命令，按期到达，愉快地接受收编。对那些由我党外围组织建立起来的关系武装，当时采取的一种办法是，派了一批干部分头到这些部队的所在地去帮助他们集中，讲明我党对待他们的政策。运用这个办法，工作都进展得比较顺利。相反，有的军分区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把一支部队开进去，命令他们来集中，结果他们害怕缴械，部队一去就都跑散了。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失败的办法。发现后，我们很快就纠正了。对于那些敌人留下来的或地主的反动武装，凡是听从调动、接受收编的，我们也尽量争取他们；但对那些不听调动、拒绝政编，甚至进行武力反抗的，则坚决予以缴械。

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通过做了大量工作，先后接受改编的杂色武装约有四、五万人。收编后，一般都集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训。被派去的干部给他们讲时局，使他

们确立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讲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勉励他们发扬三大民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和土改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随后，各军分区普遍设立了教导大队，收容、教育连排军官；团营军官则由军区集中送军大分校学习；少数高级军官则送军大分校的高级研究班。经过集训，大部军官都感到满意，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都有提高。广大士兵在经过集训以后，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被遣散回家，三分之一的人补入军区各部队。

解放初期，湖南有土匪十余万。这些土匪，有的是几十年，甚至从前清年间就开始打家劫舍的惯匪，有的是地痞、流氓靠抢劫过日子的散匪，但更多的还是被击溃的国民党军队拒不向人民投降、结伙流窜的股匪。他们多是以易于荫蔽的山区（如湘西的慈利、桃源，湘南的衡山）和湖滨（主要是洞庭湖）为巢穴。就当时的多数土匪来说，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地域性。多数土匪是湖南本地人，被打教不久又窜回来，有些人本身就是当地的地主兼土匪；另一个是政治性。矛头大都是对着共产党和革命政权的，有些土匪还戴着一副替穷人说话的假面具。他们当时提出的一些口号，既荒谬又反动，什么“打倒蒋介石，活捉毛泽东”，什么“饿死不征粮，打死不当兵”，“谁逼共产党，必杀全家”，等等。这些匪徒，经常昼伏夜出，抢劫财物，危害人民，杀害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破坏、扰乱社

会治安。如耒阳一大股匪徒，在两、三个月内就杀害了我区乡干部数十人。他们还经常威胁群众不交公粮，串通地主进行反抗。面对这种情况，清剿土匪就成了各军分区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头一项繁重而又紧迫的任务。土匪不消灭，社会不得安宁，什么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征粮支前等等工作任务，就都难以顺利开展。

我那时除了指挥主力部队作战以外，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指挥和组织部队开展剿匪斗争上面。要掌握和分析匪情，还要研究和改进剿匪战术。开始，我们的打击重点放在那些较大的股匪头上。土匪也很狡猾，为了对付我们，便把大股匪徒分散成为许许多多小股。我们也就随之改变战术，以分散对分散。有些匪徒，一打就跑，同我们兜圈子。我们就以逸待劳，一旦发现匪情，就连夜奔袭，大大减少了扑空的次数。开始，我们主要是依靠部队进行清剿，土匪往往利用当地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群众，把自己荫蔽起来。于是我们便又着重抓了发动群众的工作。除了强调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以外，还专门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去加强地方工作。例如，仅湘南军区，当时就抽调了近二千名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交给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专门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样就把军事围剿和政治瓦解结合了起来，把做群众工作和剿匪反霸结合了起来。军民同心协力，布下天罗地网，土匪无处藏身，便只有俯首就擒或主动投诚自新。

为了分化瓦解匪群，尽快肃清匪患，我们当时还很注意研究斗争策略，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我们一般是交替使用两手，一手是“拉”，一手是“打”。那时提出的口号是：拉要“拉得紧”，打要“打得狠”。对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和平解决，有时对那些明知难以争取的也先作争取，而后才用武力。只有对那些不愿放下武器、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才予以严厉的军事打击。

这些办法，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例如，在长沙和岳阳地区，只经过八、九两个月，三、四股大的匪徒就基本上被我肃清了，其中被消灭的五百多人，被争取瓦解投降的达四千多人。但是就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来说，特别是湘西和湘南地区，由于地形过于复杂，土地改革、民主反霸等斗争又尚未全面展开等多方面的原因，直到一九五〇年初我离开湖南的时候，剿匪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当时，云、贵、川和粤、桂两省许多地区都还没有解放，湖南成了四野大军挺进广西和二野大军进军西南的必经之地和运输枢纽，湘南省委和军区担负的支前任务就格外繁重。华中局给我们下达的筹粮任务，是要准备九亿斤大米，其中三亿五千万斤需要调出，两亿五千万斤留给湖南党政军食用。另外的三亿斤，只允许湖南留下五千万斤作为机动粮，其余都留给华中局机动调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连续两年湖南遭受灾荒，粮食减产。全省的税收干部只有一千人，远远不敷分配使用。要完成这项征粮支前

任务，困难真是大得很。但是，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困难再大，任务也必须完成。于是各个军分区的干部战士都积极动员起来，密切配合地方干部进行秋征。当时只有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手中有粮，交粮的任务主要落在他们头上。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我们借鉴了鄂豫两省征粮的经验。这就是充分运用区乡农代会，同时利用旧的保甲人员。双管齐下，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评议，开展反瞒田斗争，反对地主转移粮食，破坏秋征工作。经过军队和地方干部共同努力，总算筹集到大批粮食，基本上保证了几十万大军过境的需要。

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我们还认真抓了部队本身的建设，特别是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记得当时部队的思想问题，一是不愿意改为地方部队。上级号召主力部队地方化，既当战斗队，又当工作队。不少同志思想不通，感到地方部队不如主力部队，打仗少，立功不易，提拔也慢，北方籍的同志觉得地方化以后再别想回北方，讨厌南方山多、雨多、蚊子多。还有一些同志觉得干地方不如主力部队吃香、光荣，什么由地方到主力是“连升三级”，由主力改为地方是“一落千丈”一类的话也说出来了。有些同志愿意地方化，也是从个人的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觉得可以不走远路了，打仗少牺牲的危险性也减少了，婚姻问题也比较好解决了，等等。二是太平享乐和功臣自居的思想开始滋长。有的认为，胜利了，应该享受享受；有的

认为自己是**有功之臣**，虽不要封侯割地，多给点报酬总是应该的。个别的甚至贪污腐化，有的还开小差，脱离了革命队伍。三是内部团结出现新问题。新兵与老兵、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北方人与南方人都开始产生隔阂，个别的甚至散布“现在是北方人统治南方人”一类错误言论，有的对地方干部不够尊重。四是群众纪律执行不好。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不断发生，有的贱价强买老百姓的东西，个别的甚至随意打骂群众。

针对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就靠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传家宝”，认真抓好党的教育、形势任务教育、政策教育和内部团结教育，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和遵守党的政策、纪律的自觉性，激发大家的革命责任感和荣誉感。我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本质都是很好的。只要工作做深做细了，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九月间，在军区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我就给大家讲了当时面临的形势，讲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讲了军区部队既艰巨又光荣的各项任务，对于克服当时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不愿干地方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各军分区把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普遍提到了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许多领导干部亲自作报告，积极组织部队重新学习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学习全国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有的还开展了忆苦思甜和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的活动。湘西军区党委就解决当时部队的思想问题，专

门作出决议，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大量工作，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思想弯子转过来了，违犯政策、纪律的现象大大减少了，部队的内部团结也有了明显加强。

我在湖南军区工作了约半年。一九五〇年初，中央军委组建人民海军，把我和十二兵团的一大批干部调往北京，肩负起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此，开始了我在海军工作三十年的新的战斗历程。